

活化楚都大家谈

『荆小楚』，数字时代博物馆的破壁之道

张卫平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楚文化以其瑰丽浪漫、神秘深邃的特质独树一帜。而今，这一古老文明正通过“荆小楚”这一数字载体，以全新的方式讲述着“最荆州”的故事与传奇。荆州博物馆的“AI数字人讲解项目”入围全国“第四届文博社教案例宣传展示活动”终选名单，这不仅是一次数字技术应用的胜利，更是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生动实践。

“荆小楚”的设计，特色鲜明，独具匠心，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基因数字化转译。当游客扫描二维码，唤醒数字讲解员“荆小楚”时，他们开启的不仅是一项旅游讲解服务，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时尚的AI技术，在这里不再是冰冷的工具，而成为有温度的文化“摆渡人”，用时尚的方式，将楚文化精髓传递给每一位来访者。

值得关注的是，“荆小楚”的背后，是涵盖近20万件荆楚文物的庞大知识库的讲解能力。这种技术配置，打破了传统博物馆教育的多重边界。语言的藩篱，被推倒；文化的隔阂，被消除。数百人次国际游客和特殊群体的服务记录，印证了数字化传播在促进文化普惠方面的巨大潜力。如今，“荆小楚”已然成为“活化楚都”的突破口，博物馆不再只是实体空间，而成为无边界的文化节点。

当下，全球博物馆正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刻。法国卢浮宫推出的VR体验，让观众“走进”世界名画；大英博物馆开发的AR应用，重现了文物的历史场景。这些尝试，与“荆小楚”项目异曲同工。技术赋能，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动”起来，让过去单向的展示变为双向互动。荆州博物馆的创新实践表明，中国文博机构正在这条赛道上展现出独特的东方智慧。不是简单模仿西方模式，而是根植于本土文化土壤，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路径。

“荆小楚”项目的深层意义，在于重构了观众与文物的关系。传统博物馆中，观众是被动的接受者；而在数字的交互中，观众已然成为主动的参与者与意义的共同建构者。博物馆的AI讲解员，能精准地识别游客情绪并开展多模式互动，这种情感计算技术的应用，使文化传播由“千人一面”变为“千人千面”，大大地提升了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总之，“荆小楚”代表着文化传承范式的革新。当线上课堂、讲解大赛等活动借助这一载体展开之时，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得到了几何级数的扩展。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对博物馆本质使命的当代诠释：保存记忆、传播知识、启迪思想。

站在数字文明与传统文化交汇的历史节点，“荆小楚”给我们以启示，技术终将迭代，但文化的内核永恒。AI与文博教育的深度融合，关键在于找到科技与人文的黄金结合点。据悉，荆州博物馆计划“持续探索AI与文博教育的深度融合路径”。这一方向，值得期待。期待更多的荆州文化、旅游机构加入这场“活化楚都”创新实践，让荆楚文明和楚文化、三国文化在数字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未来已来，唯变不变。在“荆小楚”们的不懈努力之下，荆州博物馆的“围墙”正在消失，文化的疆域将无限扩展。这，或许就是数字化带给人类文明最珍贵的礼物，让过去拥抱未来，让创新照亮传统。

趣说楚史②

用计干掉周天子

哟，这不是谁家的那个小淮吗，都长这么大了？到了周昭王时代，在不知不觉中，楚国由一个“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孩童，成长为气血方刚、肌肉发达的英俊青年，能吃饱喝还能打，虽然还是依然为周天子办事，但浑身散发的“自信”力量，让昭王心里犯嘀咕：这楚国发展得这么快，未来肯定是个麻烦！别别，这周昭王还是有些战略眼光，看出将来的楚国肯定是个“安全隐患”，必须趁着羽翼未丰，废了它的“武功”。

但此时的楚国虽非“豺狼虎”，却已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了，要兵有兵，要粮有粮，士气旺盛，让周朝军队不敢小觑。

约公元前985年，周昭王开始“攻楚”第一战，周军渡过汉水，进入荆楚，这次战斗结果没有记载，但肯定不是没占到便宜。约公元前982年，周昭王再派祭公辛伯带兵围剿，但遭遇大风大雨和楚军的埋伏，灰头土脸，大败而归，两次都没占到便宜。周昭王感到事态严重，约公元前977年，他亲自带兵，要报两次战败之仇。可天不遂人愿，这次战败更惨，全军覆没，周昭王把自己的性命也搭了进去。

周昭王到底怎么死的，周人一直吱吱呜呜，含糊其辞地说“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王巡不返”。但《史记正义》援引《帝王世纪》记载，昭王死因是“中计乘坐楚人做的‘胶船’，船至中流，胶融船散，昭王溺水而亡”。

周昭王攻楚及其失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此后，周王朝由盛而衰，楚国则日益强大，再也不是唯唯诺诺，只能看周王室脸色度日的蕞尔小国了。

荆史新探

韩愈荆州潮州两个八月何以不同

——兼论“韩愈荆州八月”对新时代楚文化复兴的启示

袁枫

两段八月，两种历史回声。

在中国文化史上，韩愈是一个罕见的“双城记”人物：805年10月至806年6月，八月，荆州（江陵府）；819年3月至10月，八月，潮州。同样是被贬后的“量移”，同样是八月，潮州留下“一片江山尽姓韩”的奇迹，荆州却长期被视作“低谷与蛰伏”。然而，当把镜头重新拉回公元805—806年的荆州，便会发现：这八月并非“空白”，而是韩愈个人“文学自觉”与“士人精神”完成蝶变的隐秘熔炉。对今日之荆州而言，更是一座尚待激活的文化富矿。

荆州八月 韩愈的“文学淬火期”

当我们重新擦亮“荆州八月”的记忆，就会发现，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南方意象诗”，孕育了古文运动最早的“师徒共同体”，保存着“文以载道”最纯粹的精神火种。

一是“闲曹”背后的自由。贬官荆州期间，韩愈的身份是法曹参军。唐代中叶，藩镇割据，地方司法权多归节度使。韩愈所任法曹参军形同“冷板凳”。但正因“不亲吏事”，他获得大块时间来系统重读《诗经》《楚辞》，以“楚辞之浪漫”反观“古文之理性”。他完成《南行诗》初稿40余篇，确立“穷苦之言易好”的创作论。与裴均、张署、于頔诗札往返，奠定“文以载道”理论雏形。

二是从“贬谪叙事”到“江山对话”。韩愈在荆州的诗文，呈现出与潮州截然不同的“地理诗学”。《李花赠张十一》中“白花倒烛天夜明”，借物候写人格，开宋人“格物”先声；《郑群赠》中一句“蕲州簟竹天下知”，让荆楚竹编工艺成为中国首批地理标志；《春雪间早梅》《早春雪中闻莺》以荆州物候为中唐北方士人打开“南方想象”。这些作品首次把“楚地风物”升格为“国风意象”，实现地方经验与主流叙事的双向奔赴。

三是荆州幕府里的“私学实验”。韩愈钟情教育，在荆州形成独特的“师徒共同体”。他收陈彤、孟珣二秀才于幕下，次年二人同登进士；作《送陈秀才序》《送孟秀才序》，提出“无贵无贱，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比《师说》早两年；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遣使问学，韩愈以《至邓州北寄于相公书》系统阐述“古文运动”纲领。荆州因而成为“中唐古文策源地”之一。

四是从“不平则鸣”到“以文济世”。

潮州时期，韩愈是“刺史”，身份与责任促使他“实干兴邦”。荆州时期，他是“参军”，无责无权却反逼他思考“文以载道”的终极指向。从“政治失意”转化为“文学自觉”，“个人牢骚”升华为“士人使命”，“楚地经验”提炼为“天下公器”。这一精神跃迁，为后来“文起八代之衰”积蓄了思想动能。

荆州VS潮州 差异成因的深层解剖

韩愈两次被贬，在这两地的时间都是八月，但是两地对他的历史记忆却存在明显差异，分析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权力结构的制度性制约。唐代藩镇体系下的荆州属山南东道节度使辖区，司法权被裴均、于頔等藩镇势力架空。韩愈作为法曹参军，仅能处理民间细案，重大事务需“咨禀于使府”（《韩昌黎集·上于襄阳书》），其《江陵途中寄三学士》直言“判司卑官不堪说”。反观潮州，刺史虽为贬官却握有完整行政权，《祭鳄鱼文》的发布需配合军事行动，赋奴政策需用财政储备，这种“权力效率差”是两地作为差异的底层逻辑。

二是文化底蕴的历史偏差。荆州作为楚文化核心区，屈原楚辞、三国遗存构建了成熟的文化谱系。韩愈诗文中“簟竹”“李花”等意象实为对既有楚风的重述，属“文化增值”。而潮州在唐时“飓风鳄鱼，患祸不测”（《潮州刺史谢上表》），韩愈的州学建设填补了儒教制度空白，其赋奴政策改写了百越部族残余的奴隶制习俗，属于“文明奠基”。二者在历史坐标系中的价值权重本就不等。

三是纪念工程的代际传递。潮州纪念系统具有三级强化结构，远非荆州能比。物质层面，宋代陈尧佐建韩木亭，元代重修韩文公祠，明清形成“韩祠橡木八景”；制度层面，北宋咸平二年（999年）潮州官府立《昌黎伯墓碑》，将祭韩纳入官方仪典；精神层面，民间将驱鳄神话发展为“纸鸢祭祀”，《永乐大典》载“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而荆州纪念始终停留在文本悬浮态，张籍《祭退之》“江陵有书至”仅存于文集，《李花赠张十一》中“李花”在南宋方志中已失考。由于缺乏实体载体导致记忆断层。

四是个人实践的哲学转向。从工作责任上看，韩愈在荆州属“罪谪待迁者”（《上李尚书书》），在潮州属“守土之臣”（《鳄鱼文》）；从行动逻辑上

看，韩愈在荆州属内省式文学自觉，在潮州属外拓型社会改造。从精神产物上看，韩愈在荆州写《送陈秀才序》提出“道存师存”，在潮州时撰《潮州请置乡校碑》建章立制。从历史回响上看，在荆州属古文运动的理论萌芽，在潮州则属遍地儒化的实践范式。

新时代丰实“楚文化”的可行性探讨

如何让韩愈在荆州的八月，与潮州八月并立为“中国士人精神的双子灯塔”，更让楚文化在新时代的大江奔流中，以韩愈之名，再赴沧海。

一是空间叙事发力。

系统优化遗址标识，让历史场景再生。如在荆州古城墙博物馆内设韩愈专题数字展区，用全息投影重现《春雪间早梅》的“梅雪争春”场景。在唐江陵府治附近立诗地纪念碑，镌刻《李花赠张十一》并配AR扫码解读。同时植入微型文化地标。在古城花台种植李树，悬挂“李花照夜”灯光装置，替代原“李花驿”重建计划。联合竹工艺非遗传承人，在中山公园设计竹文化廊，展示“蕲州簟”编织技艺及韩愈诗句。

二是教育传承用力。

探索编撰《韩愈荆州诗选》，将“白花倒烛天夜明”等句转化为楚地物候观察课，配套开发李花生长记录手册。在荆州市研学基地设置“古文运动”体验工坊，让学生体验用简牍摹写韩愈书信。同时探索学术联动机制。建立韩愈研究数字平台（非实体中心），整合荆楚高校古籍所资源，形成“荆州八月”专题数据库，提供高清图文（江陵途中寄三学士）等手稿影像。

三是传播借力扬声。

探索国际传播。加入“东亚儒学遗迹”申遗体系，将韩愈荆州诗文作为“长江儒学廊道”组成部分。与央视《中国诗词大会》合作开发“唐诗地理”特辑，荆州篇聚焦韩愈南方意象创造。尝试节庆设计。每年三月举办“李花诗会”，联合一些文学期刊网刊组织相关活动并颁发“韩愈新诗创作奖”，提高影响力。

从“过客记忆”到“可持续遗产”。荆州的文化觉醒不在于重建一座韩愈祠堂，而在于将“簟竹夜月”“李花照夜”转化为可触摸的生活美学。当学生在生物课上记录李花花期，当主妇选用餐椅餐垫装点餐桌，当游客在古城墙扫码听见“风霜酸苦稻苗死”的诗句——这八个月的精神熔炉，终将在人间烟火里重生。

改变楚国命运的十件大事(下)

世标

六、齐楚争霸：霸业初成的召陵之盟

楚成王熊渠（公元前671年——前626年在位）时期，楚国国力蒸蒸日上，尤其是铜产量跃居列国之首。北方霸主齐桓公为遏制楚国北扩势头，联合八国诸侯伐楚。双方最终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东）会盟。虽然楚成王名义上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并承诺“贡包茅”，但齐桓公并未迫使楚国做出实质性让步或屈服。这次会盟，是楚国首次以平等身份与中原霸主进行重要外交谈判。

召陵之盟标志着楚国正式成为能与中原头号强国分庭抗礼的南方霸主。楚成王通过成功的军事威慑与外交周旋，稳固了楚国在江淮流域的霸权，其霸业基础由此奠定。

七、问鼎中原：霸业巅峰的庄王时代

楚庄王熊侣（公元前613年——前591年在位）即位初期，韬光养晦，“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亲政后励精图治。公元前606年，他借北伐陆浑之戎之机，陈兵洛邑郊外，“问鼎之大小轻重”，公然挑战周王室权威，震动天下。公元前597年，楚军在郟之战（今河南荥阳北）中大败当时最强的晋军，此役是楚国对晋国霸权的决定性胜利。

郟之战的大胜与“问鼎中原”的壮举，标志着楚庄王的霸业达到顶峰，楚国成为无可争议的天下第一强国，中原诸侯莫敢擅其锋，是楚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八、吴国破郢：盛极而衰的切肤之痛

楚昭王（公元前516年——前489年在位）时期，楚国因内政腐败和连年征战，国力有所损耗。吴王阖闾在孙武、伍子胥辅佐下，联合唐、蔡两国，千里奔袭，五战五捷，于柏举（今湖北麻城）大败楚

军，并一举攻破郢都。楚昭王仓皇出逃，几乎亡国。幸赖大夫申包胥“哭秦庭”七日七夜，感动秦哀公发兵救楚，加之吴国内部生变，越国趁机攻吴后方，吴国退兵，楚昭王才得以复国。此役后，楚国元气大伤，被迫迁都于郢（都郢）。

吴国破郢是楚国历史上空前的奇耻大辱与重大危机，它彻底暴露了楚国在鼎盛表象下的深层隐患，标志着楚国自庄王以来的绝对霸权终结，被迫进入战略守势，是国运转折的明确信号。

九、吴起变法：富国强兵的未竟之业

战国中期，楚悼王熊疑（公元前421年——前381年在位）为扭转颓势，任用因在魏国变法卓有成效而遭排挤的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吴起变法核心在于“损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裁汰冗官冗费，剥夺部分旧贵族世袭特权，强令其迁往地广人稀的边疆开垦，节省的财富用于“抚养战斗之士”。同时整顿吏治，统一舆论。变法效果立竿见影，“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然而，变法严重触犯了旧贵族利益。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刚去世，旧贵族即在葬礼上发动叛乱，乱箭射杀伏在悼王尸体的吴起。

吴起变法早于秦国商鞅变法30年，是一次深刻而激进的富国强兵改革，其成效证明变法方案切实可行。然而，因楚悼王早逝、旧贵族势力根深蒂固且反扑残酷，变法最终夭折。这不仅使楚国错过了重新崛起、统一中国的历史机遇，也预示了楚国后期难以克服的痼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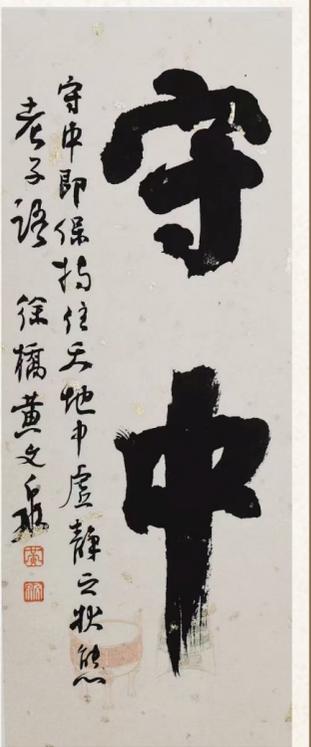
十、迁都陈寿：江河日下的最后挣扎

战国后期，秦国崛起并持续东进，楚国节节败退。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

文化荆州

二〇二五年第三十五期 总第一百六十七期  
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

翰墨荆楚③



守中 黄文泉书